

自然正当、虚无主义与古典复归

——“古今之争”视域中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王升平 著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自然正当、虚无主义与古典复归

——“古今之争”视域中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王升平 著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然正当、虚无主义与古典复归：“古今之争”视域中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 王升平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7

ISBN 978 - 7 - 218 - 09188 - 4

I. ①自… II. ①王… III. ①斯特劳斯, L. (1899 ~ 1973) —虚无主义—研究 IV. ①B712.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2286 号

ZIRAN ZHENGDANG, XUWU ZHUYI YU GUDIAN FUGUI

自然正当、虚无主义与古典复归

——“古今之争”视域中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王升平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责任编辑：卢雪华 黎捷

装帧设计：张力平 陈小丹

责任技编：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 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 - 7 - 218 - 09188 - 4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2.75 插页：2 字数：176 千

版次：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 - 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81479 83780517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主 任：庾 震

副主任：蒋 斌 朱仲南 王桂科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晋清 万 山 王 珺 田 丰 李夏铭
何祖敏 宋朝晖 钱永红 倪 谦 曾 莹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

主 任：蒋 斌

副主任：田 丰 王 珺 蒋述卓 陈春声 胡社军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晋清 王红一 毛艳华 卢晓中 刘少波
李庆新 李宗桂 吴承学 张振刚 陆家骝
陈金龙 陈鸿宇 林有能 罗必良 钟永宁
扈中平 董天策 温宪元 蔡 禾 鞠实儿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自然正当的理论谱系：从古典自然正当论到现代 自然权利论	19
第一节 古典自然正当理论的兴起及其流派	19
第二节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与现代自然权利论的价值 取向	33
第三节 现代自然权利论与现代虚无主义的关联： “古今之争”视域中的考察	45
第二章 自然正当的命运与虚无主义的兴起：从价值 领域的诸神之争谈起	58
第一节 寻求人类社会的终极依据：诉诸启示还是诉诸 理性？	58
第二节 历史主义与自然正当：历史能为政治生活提供 终极价值吗？	71
第三节 技术理性与自然正当：现代理性主义能解决 价值问题吗？	83
第三章 对自然正当的拒斥与西方虚无主义：施特劳斯 与尼采、海德格尔的论争	96
第一节 虚无主义及其克服：施特劳斯与尼采的分歧	96
第二节 施特劳斯与海德格尔：何种虚无主义？何种 古典？	107

第三节	自由与虚无：如何在确保自由的同时避免 虚无主义？	117
第四章	自然正当与自由民主政制：施特劳斯的政治 理想图景是什么？	126
第一节	尼采式的超人社会与科耶夫式的普遍均质国家的困境 ——基于施特劳斯理论视角的反思	127
第二节	现代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价值困境	140
第三节	施特劳斯的文明理想究竟是什么？	150
第五章	结语：寻求自然正当能克服现代虚无主义吗？	163
参考文献		180

导 论

一、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20 世纪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现代性进程不断加速的社会，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集中突显的社会。现代性问题的集中突显，催生了学者们反思现代性问题的智识努力，而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正是这种智识努力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施特劳斯围绕着西方现代性这一根本问题，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及现代政治哲学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对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在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大行其道的西方社会，施特劳斯重新提出并探讨了“古今之争”“诗与哲学之争”“理性与启示之争”等话题，为克服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困境、复兴古典政治哲学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影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涉及诸多方面，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关切。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的价值问题有着独特的见解：首先，在对现代性问题的归因上，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归结为虚无主义（Nihilism）。在施特劳斯看来，这种虚无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现代西方人再也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①。这样一种

^① [美] 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2 页。

虚无主义的状态，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迷失的状态。其次，在克服虚无主义困境的思路中，施特劳斯的基本主张是要复归古典政治理性主义去寻求那种具有客观性、恒定性的自然正当。施特劳斯认为，现代虚无主义之所以产生，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再相信永恒价值，不再寻求价值评价的客观依据，不再认为理性能够认知和证明恒定价值。所以，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跳出现代性的立场，复归古典政治理性主义来观察现代性，寻求现代性问题的解决之道。从施特劳斯对古典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的寻求上看，他实际上是主张以恒定的、以自然为根基的价值取代那种流变的、以人类认同为根基的价值，这与当前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观点形成了冲突。

在本书中，我们对施特劳斯思想的考察，也试图基于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的价值问题的反思而展开。我们在本书中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施特劳斯的视域中，对自然正当的拒斥为什么是导致现代西方虚无主义问题的重要根源？寻求古典自然正当的复归为什么是解决西方虚无主义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此外，究竟什么样的政治架构是符合自然正当，并且能够避开现代虚无主义困境的？在笔者看来，从价值反思的视角对施特劳斯思想进行考察，对于现代性进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政治哲学研究也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潮影响的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其意义可能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能为我们克服当前政治学研究中所可能存在的价值虚无主义倾向提供思路。如前所述，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虚无主义倾向主要源自于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根据施特劳斯的逻辑，历史主义之所以与虚无主义相关，主要在于它以价值的相对性否认了价值评价的终极标准，从而使事物评价的终极标准成为阙如^①；而实证主义之所以与虚无主义相关，主要在于它以事实和价值的两分排除了价值问题科学化、

^①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1-8.

客观化的可能，从而使对价值问题的思考本身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①。施特劳斯从价值论视角对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上述倾向的反思，在当今这样一个普遍价值被斥之为极权和专断，而实证主义又基于其科学主义的立场而斥政治哲学为非科学的背景中，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政治哲学研究中的相对价值与普适价值、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视角。它提醒我们去对现代性进程中那些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重新进行评估和反思，既不要简单地推断相对主义优于普遍主义，也不要去简单地推断价值中立优先于价值关联。更为直接地说，考察施特劳斯之所以批判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并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相关联，以及他为什么要批判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又是如何与虚无主义相关联的内在逻辑，其首要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我们认清价值虚无主义产生的根源，从而能够在学术研究中力求自觉地去避免这样一种可能的倾向，以确保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合理化。

其次，它能为现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摆脱“现代化范式”的困扰提供思路。所谓现代化范式，指的是一种以西方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范本、以传统—现代的二分为基本分类的、“有着明显的‘思维定式’成分或‘前见’性功效的未经质疑的有关现代化的规范性信念”^②。摆脱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是确立中国学术自主性的前提，是中国学术界得以真正基于自身的情境而思考中国的前提。要摆脱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中国学术界首先要做的是必须确立起一种“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基于中国的情境而真正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中国学术才能真正对世界发言^③。而施特劳斯对自然正当理论的强调、对虚无主义问题的反思，有助于推动我们去进行这种思考。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为我们认清西方所宣扬的所谓“现代化范式”的普适性的特殊主义本质提供了前提。因为根据

①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57, Vol. 19: 343 - 368.

②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80 页。

③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26 页。

施特劳斯的逻辑，那种“现代化范式”所赖以生存的西方现代性，其实只是一种基于西方文化传统而生长起来的“意见”或意识形态，它可能并没有任何自然正当的根基。另一方面，它也为我们去发现中国式的自然正当、寻求中国式的政治理想图景提供了思路。这是因为，所谓中国式的理想图景，其实也正是中国发展方向的一种根本判准，这样的判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是施特劳斯所言的自然正当的外化和表现。如果说施氏的自然正当的发现要以复归西方的古典传统为前提的话，那么，中国式的现代化问题的发现和解决、“根据中国”的自然正当的挖掘，可能也要求我们去重新发现中国的古典，重新从中国的古典传统中去寻求资源。

当然，从古今之争的视角来探讨施特劳斯对自然正当和虚无主义问题的思考，其意义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有着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之一表现在，它能为我们找寻一种观察现代性问题的正确立场提供有效的思路。现代性进程已经揭示，随着现代性浪潮在全球的席卷，现代性的各种问题也随着现代性的展开而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首先必须去追问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性的根本问题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现代性问题是我們通常所说的人口与环境问题、贫困问题、城市化问题，还是有着其他更为根本的、尚未进入我们的反思领域的问题？现代性问题之所以层出不穷，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只是抓住并解决了一些现代性的枝节问题，而真正的问题还游离于我们的视线之外？对现代性问题的发掘，要求我们具备一种观察现代性的正确立场。在施特劳斯看来，在当今的西方世界，由于浸淫于现代政治哲学所构设的现代性的汹涌浪潮中，人们看任何事物都戴上了现代性的眼镜。由于这副眼镜的存在，我们的反思，实际上都是站在现代性立场中的反思，这种立场决定了我们可能无法发现现代性问题之真实。施特劳斯告诉我们，要发现现代性的问题，首先要跳出现代性的立场。施特劳斯跳出现代性立场的思路是返回古典政治哲学，即从古典的立场、以古人的标准来审视现代。这样一种从古典来审视现代、以古典的标准来反思现代的立场，我们认为正是施特劳

斯的政治哲学所留给我们的最大贡献之一，它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且民众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生活准则的中国而言，提供了一种反思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有效思路。

启示之二在于，它为我们深入思考和定位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价值体系构建问题提供了思路。如果说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根本在于价值虚无主义的话，那么，从中国式的现代化逻辑出发，我们也无法完全排除其出现价值虚无主义问题的可能。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对其加以避免？在笔者看来，避免虚无主义，首先必然要涉及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问题。只有在确立起一种能够有效地凝聚社会全体的核心价值的基础上，现代化进程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正当善恶的标准才能得以有效确立。但问题是，在确立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却很少有人去思考隐含于其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比如：这种核心价值究竟应当是相对的，还是普遍性的？它应当是流变的，还是恒定的？它应当是基于信仰、意识形态或是习俗、共识而确立起来的，还是基于某种自然正当的背景而确立起来的？还有，这种核心价值之所以能够克服虚无主义倾向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上述问题都与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之确立的有效性、科学性紧密相关。缺乏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思考，核心价值的确立要么可能或多或少会走一些弯路，要么它可能由于未经系统的反思性考察、阐释不充分而无法得到更多人的科学、理性的认同。而施特劳斯从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立场对西方现代性的价值论思考，对于回答上述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1. 国内对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理论和虚无主义批判思想所进行的考察。

我国对施特劳斯思想的引荐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①。近二十余年来，以李天然、刘小枫、申彤等为代表的学者翻译和编辑了大批施特劳斯的论著，引进了一批西方学者研究施特劳斯思想的相关作品，为国人了解和深入挖掘施特劳斯思想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进入21世纪初期，国内掀起了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的热潮，涌现出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关于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和虚无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考察自然正当与现代性“浪潮”之关系的视角来探讨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理论和虚无主义批判思想。

施特劳斯对古典自然正当论的现代命运的考察，主要体现在其对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相关论述中。因此，从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浪潮理论入手考察其对自然正当和虚无主义进行的思考，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田光远在《论列奥·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一文中认为，在施特劳斯那里，现代性的每一次浪潮的出现，都既是现代性的一种“不断完善”，也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进一步背离。现代性第一次浪潮的代表者马基雅维利开启了政治去道德化的进程，政治中立化由此初现端倪；以卢梭为代表的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则将人性看作历史的而非自然的，由此而背离了古典政治哲学的自然主义思路；在第三次浪潮中，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达到顶峰，“自然”和“神”的位置自此被完全弃置^②。王彬的《自然权利的现代困境》一文则从解读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着手，考察了政治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变。在王彬看来，根据《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的逻辑，霍布斯与洛克共同开启了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这种转变的核心是由古典的作为“客观的法则

① 国内目前可见的关于施特劳斯的 earliest 译作，是1985年出版的、由古尔德等编著的《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一书中所收录的由施特劳斯所作的《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文。可参见[美]詹姆斯·A. 古尔德、文森特·V. 瑟斯比编，杨淮生、王缉思、周琪等译：《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 田光远：《论列奥·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载《求索》2007年第7期。

与尺度”的自然法转向了主观的权利。这种转变意味着，古典时代那种义务主导的思路变成了权利主导，对德性的强调变成了对欲望的满足。卢梭是现代性的批判者，但他同时也成为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的推动者。卢梭的这种推动表现为他对历史进程的强调：“卢梭认识到，人类的特质并非是自然的赐予，而是人类在改变自然或克服自然而有所作为或被迫有所作为的结果，人道乃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因此人们就有可能在历史过程中寻找行动的准绳，近代历史观念就此被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① 现代性进入到第三次浪潮时，以尼采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学者们开启了激进历史主义的大门，开始了对西方自然权利传统的彻底拒斥，从而进一步步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

第二，从比较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思想之异同的视角对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和虚无主义批判思想进行考察。

在施特劳斯的思维体系中，现代与古典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异？这一问题直接关涉施特劳斯之所以批判现代性、主张古典复归的根本原因，是把握施特劳斯思想所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鉴于此，国内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对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和虚无主义批判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

甘阳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一文中对施氏的自然正当理论和虚无主义批判思想的考察，部分地就是从这种比较视角入手的。在甘阳看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的基本思想就是论证“17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说及其带来的‘历史观念’的兴起，导致了西方古典的‘自然正义’或‘自然法’（Natural Law）的衰亡”^②。这意味着，古典与现代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强调自然正当与强调历史主义的区别。甘阳认为，施特劳斯与尼采在历史主义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在尼

① 王彬：《自然权利的现代性困境——解读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载《山东大学法律评论》2007年卷。

②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施特劳斯著，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页。

采那里，现代性的生成所导致的最大后果之一是在评价善恶好坏的标准上的变化：在历史观念兴起之前的“贵族道德”中，其全部基础是以“最大的敬意尊重老年和传统”，而现代性的兴起，则着意于取消“高贵”与“低贱”的区分，把“进步”与否作为评价好坏的标准^①。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基本上继承了这种看法。郑兴凤在《古今之争与古典政治哲学》一文中较为具体地考察了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的“古今之争”，并对施特劳斯所重提的“古今之争”的内涵进行了阐释。在郑兴凤看来，施特劳斯在古今之争问题上的立场是厚古而薄今，而这种厚古薄今的态度，实际上正是针对当今历史主义的那种拒斥恒定的自然正当、认为历史必然进步的观点而言的。郑兴凤认为，在施特劳斯那里，现代并不必然优于古典：现时代强调自由而忽视了人的德性，“忘记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尚、出类拔萃、德性完美”；同时，现代人追求权利，而忽视了责任之重要性^②，无论哪一方面，都体现出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相对于古典的进步。陈建洪的《施特劳斯论古今政治哲学及其文明理想》一文，则主要从古今政治哲学对于政治社会之起点的理解、对于人性的理解、对于理性教育的态度、对于“隐微”“显白”的看法之不同这四个方面，对古今政治哲学之差异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古典政治哲学家试图在言辞中构建一个完美的城邦，但“对此理想国家在事实上的实现并没有心存幻想”；与古典政治哲学不同，现代政治哲学则放弃了古典意义上的那种“非历史的、完美的和绝对的标准”^③，而试图去追寻文明理想的历史化和现实化，这既是对古典的那种绝对化文明理想的弃置，也是对人类文明理想的降低。

第三，从比较考察施特劳斯与其他西方学者在相关问题上

①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施特劳斯著，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页。

② 郑兴凤：《古今之争与古典政治哲学》，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

③ 陈建洪：《施特劳斯论古今政治哲学及其文明理想》，载《世界哲学》2008年第1期。

的不同看法来研究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和虚无主义批判思想。

在对待自然正当、虚无主义和古典政治哲学的问题上，施特劳斯与其他学者存在着怎样的意见上的差异？这些不同观点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对于厘清施特劳斯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厘清施特劳斯思想的来龙去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刘小枫的《刺猬的温顺》是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在《刺猬的温顺》一文中，作者考察了施特劳斯的价值一元论、绝对主义倾向与柏林的价值多元论、相对主义倾向之间所存在的冲突，这种冲突，实质上也正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普遍主义倾向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历史主义倾向之间的冲突。以这种冲突为线索，作者进一步考察了施特劳斯所强调的古典自然权利论的特点，以及施特劳斯在解读古代经典的过程中所发现的古代和现代在面对哲学与政治之冲突、理性与启示之冲突时的不同态度^①。除《刺猬的温顺》之外，刘小枫的《施特劳斯的标路》一文也对施特劳斯与尼采、海德格尔在面对古典政治哲学时的不同态度进行了考察。在刘小枫看来，“尼采、韦伯、施米特、海德格尔都把虚无主义的‘技术时代’说成现代性的表征，海德格尔还追随尼采对苏格拉底的‘科学秘教传播者’的指控，把‘技术’的虚无主义根源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对这些思想前辈的现代性诊断本身——虚无主义的‘技术时代’，施特劳斯没有异议。但究竟何为‘技术’的虚无主义本质，其根源又何在，施特劳斯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②。在施特劳斯那里，现代政

① 刘小枫：《刺猬的温顺》，载《书屋》2001年第2期。

② 贺照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关于施特劳斯思想与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就目前笔者的阅读范围来看，国内开展过较为深入的研究的学者，主要以刘小枫教授为代表，另外，李世祥在其《洞穴与哲人——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对重返洞穴的解释》一文中的探讨，也较具代表性。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第三章中关于施特劳斯与尼采和海德格尔思想的比较研究，也颇受刘小枫、李世祥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启发，在此表示感谢。参见刘小枫：《施特劳斯的标路》，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李世祥：《洞穴与哲人——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对重返洞穴的解释》，载《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

治哲学的危机源于“前现代的政治哲学的彻底变异”，换言之，在尼采与海德格尔那里，苏格拉底都是造成现代性困境的历史罪人，而施特劳斯则正是要为苏格拉底及其政治理性主义辩护，因为，在施特劳斯的视域中，古典政治理性主义对自然正当的寻求与现代性困境的生成之间是没有任何干系的。除刘小枫外，周枫在《列奥·施特劳斯为什么以及怎样批评卡尔·施米特》一文中也从考察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思想之关系入手，探讨了他们在对待古典与现代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周枫认为，施特劳斯之所以批评对于自由主义同样持批判态度的施米特，是因为在施特劳斯看来，施米特的批判仍然没有克服自由主义所普遍具有的虚无主义特征。对于宣扬古典政治理性主义和自然正当的施特劳斯来说，施米特虽然强调了要区分“敌我”，但具体根据什么来进行区分，施米特并没有提出一个普遍的标准^①。

2. 国外关于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和虚无主义批判思想的研究。

相对于国内而言，国外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早。早在20世纪中后期，以施特劳斯学派为核心的学者们就相继编辑出版了一批施特劳斯的传记、论文集和通信集，为学界进一步挖掘和探讨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提供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新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的扩大及施特劳斯学派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的扩张，施特劳斯的学说也进一步为学界所关注和重视。自此，不论是施特劳斯学说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参与到了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的讨论中，基于其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对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从目前笔者所掌握到的资料来看，国外学界对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和虚无主义批判思想所进行的考察，大体可归为如下三类。

第一，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切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思想，以考察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理论和虚无主义批判思想。

① 周枫：《列奥·施特劳斯为什么以及怎样批评卡尔·施米特》，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论及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的学者，以丕品、吉尔丁等为代表。在《施特劳斯的现代世界》一文中，丕品认为，在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浪潮理论中隐含着关于古典与现代之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古典政治哲学家看来，政治与哲学之间、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不存在“和解”的可能；而现代政治哲学则恰恰认为这种和解是可能且可欲的：“现代传统中的一个核心期盼是认为某种非自私性的自由原则可以成为一个普遍自治的、社会整合的、自我繁殖的——或我所称的一个和解的——政治的共同体的基础。”^① 这样一个和解的社会，是一个以自治为基础、以权利为主导的社会，根据施特劳斯的逻辑，它也将是一个导向实证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社会。据此，丕品认为，施特劳斯的“总体立场明显具有某种严格的分裂性：要么是存在着一种关于正当的自然的（不是习俗的，也不是假定的）标准，要么（如果不是开端，就是最终）就是实证主义、历史主义、虚无主义”^②。吉尔丁的《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施特劳斯论卢梭》一文，则主要揭示了施特劳斯之所以把卢梭看成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的推动者，从而是对古典思想之进一步背离的原因。吉尔丁把这种原因主要归为两个方面：首先，卢梭虽然批判科学与艺术，但实际上守持的是一种进步观念，他“相信人类知识有了意义重大的进步，只不过这一进步的后果的广泛传布并不能推动道德和社会进步”；其次，在卢梭那里，“人的人道（man's humanity）不是来自人的自然（his nature），而是长期发展的产物”，换言之，卢梭从关注自然权利转向了关注历史领域^③。

第二，从施特劳斯与其他人物之关系的视角切入施特劳斯思想，以考察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理论和虚无主义批判思想。

① Robert. B. Pippin. The Modern World of Leo Strauss [J]. Political Theory. Vol. 20, No. 3 (Aug., 1992).

② Robert. B. Pippin. The Modern World of Leo Strauss [J]. Political Theory. Vol. 20, No. 3 (Aug., 1992).

③ [美] 吉尔丁：《现代性的第一次危机——施特劳斯论卢梭》，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479-489 页。